

农业经济论丛

8

农业出版社

目 录

农 展 村 战 发 略	走向新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 ——成就、问题及展望……………牛若峰 (1) 论农村商品生产逆向开发战略……………张沁文 (9) 关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问题的研究……………谢 之 (15)
论列宁建立社会主义农业之路……………李庆曾 (25)	
劳 经 动 济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研究……………陈永正 (48) 广东省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预测与对策……………江 华 邹 帆 (63)
粮农问题	对我国粮食发展战略的再探讨……………邓 贤 (70)
贫 发 困 与 展	关于综合开发贫困地区的思索……………黄永森 (78) 中国西部开发与西部农村发展……………吴通全 周会平 (85) 贫困山区治穷致富的理论和政策……………张沁文 王文德 (91) 从黔、桂贫困地区现状谈贫困与发展……………张红宇 孙 林 (102)
城 关 乡 系	城乡一体化机制初探……………王育琨 (110) 论以工补农……………周 诚 毕宝德 (125)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商品交换关系 ——江苏省江阴县的调查……………黄河清 (131)
农 金 村 融	论创汇农业与农业贷款……………赵 荣 (142)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症结与出路……………熊建勇 (147)
农村市场与 社会化服务	关于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几个问题……………闵耀良 (152) 农村市场体系问题初探……………丁声俊 (161)
乡 企 镇 业	乡镇企业发展新阶段的思考与对策……………李炳坤 (171) 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目标选择……………张立早 (181)
土地经济	关于保护地力的思考……………许继光 (186)

结构 与 节	试论系统工程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应用.....刘书楷(191) 略论农业宏观调节体系.....何子阳(199)
综 合	关于农村经济中公平与效率的若干想法.....陈 健(205) 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从美国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系谈起.....徐更生(212) 发展中国家农业价格政策及对我国的几点启示.....周 猛(222)

走向新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

——成就、问题及展望

牛 若 峰

要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状况进行详尽而清晰的分析与述评并非易事，因为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的图象本身还不清晰。这里谈的仅是自己的看法，带有一定的探讨性质。

一

众所周知，1958年我国农村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实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稍后定型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包罗一切，高度集中的集体经济体制。在那种体制下，劳动者与经营者相脱离，农民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和积极性，农村经济缺乏动力和活力。“理想化”的人民公社制度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对此，我国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七十年代末起，经过安徽、四川等地的试验，我国农村逐步实行了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否定了被历史证明并不成功的人民公社制度，而代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使劳动者与经营者统一起来了。据1984年统计，全国农村99%的生产队和96.6%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少量的队户实行了小组集体承包制。这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结构的合作经济，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一举改变了农村过去那种单调的、令人窒息的经济结构，使得整个农村开始出现多样化的经济成分、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和生动活泼的社会格局，从而使农民的积极性迅即迸发出来了。

农村改革的成功，加上调整农产品价格^①和增加物质技术投入^②及其他配套措施^③的实施，使八十年代初中国农业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一）农业的高速度增长是空前的。1979—1984年，全国农业可比产值年均增长9.4%，比1953—1978年26年年均增长3.2%的速度高出近2倍；同期，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6.4%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年均增长5%，比1953—1978年26年年均增长2.4%的速度高出1倍多。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亿多吨增加到1984年的4亿

① 1979年18种农副产品牌价、议价和超购加价总指数上升22.1%。粮食统购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棉花收购价提高15.2%，超购部分加价30%，六种植物油统购价提高24.97%，生猪收购价提高24.6%。1977年以前，中国粮棉比价1:9.7，1979年以后为1:10。

② 1979—1984年间，农业机械动力从1.82亿马力增加到2.65亿马力，增长45.6%；同期，化肥供应量从1086万吨增加到1773万吨，农用电从282.7亿度增加到462亿度，分别增长63.4%。

③ 同期，国家还进口了大量粮食，使农业得以休养生息，调整生产结构。

吨, 年均增长 1700 万吨, 人均占有量从 318.5 公斤增加到 395 公斤; 同期棉花总产量从 216.7 万吨增加到 625.8 万吨, 人均占有量从 2.27 公斤增加到 6.1 公斤。虽然这个水平仍然是相当低的, 但是毕竟缩小了我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例如, 1978 年时我国粮食和棉花的总产量分别占世界的第 1 位和第 3 位, 人均粮食和棉花占有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84% 和 75%; 到 1984 年, 我国粮食和棉花的总产量都占世界第 1 位, 人均粮食和棉花占有量分别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 91.5% 和 157%。

(二) 农村经济的多样化和开始转向商品化。随着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单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渐解体, 代之而起的是多种多样的地域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以及为数众多的独立的农户家庭经营和各种过渡型的混合经营企业。农户家庭虽然仍带有向集体承包的性质, 但不可否认的趋势是, 农户经济及其他形式的农村个体企业正在大规模、迅猛地发展着。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农民收入增长。1978 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 134 元, 而 1984 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已超过 355 元, 增长 1.6 倍, 年均增加 59 元, 这与 1978 年以前 20 年间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只增加 24.5 元, 年均增加 1.23 元形成鲜明对照。非常有趣的是, 1978 年前农民主要是从集体分配中获得低微的收入, 而现在则主要是靠家庭经营获得收入, 其中 90% 来自商品生产。

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来源构成

时 间 项 目	1978年	1983年	1984年
平均每人纯收入 (元)	133.57	309.77	355.3
各收入来源占的比重 (%):			
(1) 从集体经营中分得的收入	66.3	11.6	10.0
(2) 从经济联合体得到的收入	—	0.3	0.8
(3) 家庭经营收入	26.8	70.0	80.3
(4) 其他收入	6.9	2.1	8.9

(三) 乡镇企业和农村非农化趋势改变了我国农村的古老形象。农民获得自主权, 农业商品化趋势和整个中国国民经济放活的必然结果是农村非农化、农民兼业化, 这种趋势对改变我国农村的形象来说也是历史性的。1979—1983 年, 农村工业、建筑和建材工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发展很快, 其产值翻了一番, 到 1984 年, 各类乡镇企业达 600 万个, 职工人数 5200 万, 总产值 1709 亿元, 占到全国社会总产值的 13%, 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1980—1985 年间, 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 2.5 倍, 从业人员增加 3400 万, 增长 1.13 倍; 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 由 1980 年的 26% 上升到 1985 年的 40%。在农村非农化发展中产生了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就是农民的转业和转移问题。由于我国特殊的户口制度和产业政策, 农民长期以来都被束缚在农业上, 而今天则出现了松动的机会。出现这种机会的关键是产业政策放宽, 允许农民兼业和经营非农行业, 从事运销, 进城开设坊, 兴办服务业, 提供各种劳务。这种新政策为农民劳动致富开辟了新的门路。有了钱的农民就开始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首先是盖新房, 增加商品购入量, 这方面的支出占到农民总支出的 60%。部分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的生活改善较大, 他们开始由第一生活需要产品的需求转向对第二生活需要产品 (中高档用品) 的需求, 从而预示了我国民用工业的大发展具有极为广阔的市场。

(四) 为消费者提供了较大的选择机会, 使人民生活开始向小康型转化, 由于农产品总供给量的显著增长, 为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提供了较多的选择机会, 现在人们比任何时候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 表明人民生活已开始向小康型转变。与此相适应, 素来以粮食种植为主的我国农业开始向较快地发展畜禽养殖业和园艺经济转变。为了促成这种转变, 也为了缓解农产品供给增长所造成的问题, 1985 年我国实行了一项大的新改革, 就是废除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 改行合同定购制度, 并辅之以相应的价格调整, 还将实行税制改革等。人们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称之为农业的第一次改革, 而把购销制度的改革称为农业的第二次改革。这次购销制度改革的结果如何,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整个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改革和配合。这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五) 一代新型农民正在形成和崛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 是我国一代新型农民正在形成和崛起。我们高兴地看到, 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具有独立思考能力, 以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态度和新的眼光看待一切, 并且成为农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民获得自主, 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使广大农民赢得自立的话, 那末, 广大农民掌握了文化、科学技术则使他们获得自由。从自主到自立再到自由, 这就是我国新型农民的成长过程。与此并行的是农民逐步走上联合与合作的过程。我们党的和政府的各级机构, 及其他组织, 要舍得花费代价加强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科学技术职业教育, 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 促进新一代农民全面成长。这样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型农民, 具有振兴农村的远大抱负和必备的才能, 对于加速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 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 将会起无法估量的作用。

上述清楚地表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其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 已从许多方面改变了我国农村的传统形象, 使农村呈现出一种全面开发的生动活泼的新局面。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 吃饭是头等大问题, 农业曾经是一个极其令人担忧的产业部门, 最近几年竟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引起各方人士的注目。

二

过去, 农业经济科学研究总的来说是不发达的, 那时的研究主要是论证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革和现行政策的合理性, 但没有很好地研究生产力发展问题, 包括对市场、价格、自然资源、国际贸易等问题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当然, 这是复杂原因造成的, 不能怪农业经济学家本身。

但是, 随着农村经济的放开搞活, 这几年农业经济研究工作也迈向了一个日趋兴旺的新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有下述特征:

(一) 思想解放, 勇于探索。农业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们越来越面对农村的现实, 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发展研究。与过去关在房子里作文章论证和注释现行政策不同的是, 人们把参与农村问题的调研和决策作为新的时尚, 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今天才真正开始得到较好的体现和发扬。1981 年以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每年都颁发一个重要的农业政策文件, 它们之所以能有效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有相当长远的指导意义, 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大批农业经济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和讨

论。1985年，将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制度，也是在农业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者酝酿讨论了很久才作出决策的。今天的农业经济学家不拘泥于现成的结论和现行政策，思想解放，勇于探索，敢于依据实际情况诚实而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那些与现行政策相悖的见解也可以发表出来。例如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的会刊《农业经济问题》上，就发表过一些引起争论的研究文章，进行了自由的讨论。

(二) 农业经济科学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随着农业问题日渐增多，农业经济学家们日益增多地参加调研和决策，农业经济科学的重要性也日渐显露出来，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中国农经学会非常活跃，除每四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外，还组织了十二个全国性专门研究会，各省市都有农经学会，甚至许多地区、县份也建立了农经学会，每年都召开许多讨论会，分析讨论诸如农村劳动力转移、农工商、产业结构、农产品流通与价格、生产责任制、国营农场、国际农业、技术经济、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区划等问题，把讨论的意见归纳发表或向决策机构反映。各级政府及其他工作部门，为了更好地把握农村发展实际，真正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带指导性的意见，纷纷组建新的农业经济研究所，大学里农业经济科系成为热门领域，从中央到地方的宏观发展研究几乎都有农业经济学家的影子。令人鼓舞的是，1983年以来农牧渔业部把农业经济科研成果列入科技改进奖和科技进步奖的范围，成就比较突出的一些农业经济研究者获得了政府的奖励。

(三) 研究方法有了很大改进，研究领域明显拓宽。为了适应多样化的农村现实，农业经济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也做了不少探索和改进。过去，我国农业经济研究主要采用抽象法或演绎法。其结果常常是模糊的或是“永远正确”的，但很难解决实际问题。今天的农业经济研究开始较多地引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农科院农经所为使研究方法多样化，也多次邀请外国的专家到中国讲学。我国一些经济学家作为访问学者也到外国进行学术交流。但是，从外国引进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如何能较好地适应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大家正在进行这种探索。农经界许多专家接受政府经济机构或公司企业的委托，共同研究论证农业经济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大大增强了各种建设项目和重大措施的依据性，从理论和方法上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农业技术经济学”。其中，在运用多种定量方法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许多研究生在其研究论文中，也较多地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中国农科院农经所根据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计划而进行的“2000年中国农业”的研究，在定性方法的指导下，较多地运用了计量方法。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与农业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联合研究农业发展问题和技术经济政策问题。这类研究无疑将为政府制定经济社会长期发展规划提供依据。当然，除了计量方法之外，怎样把诸如社会学、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分析方法运用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也仍在探索之中。

(四) 我国农业经济学界正迈入新阶段的明显标志，自当首推新一代农业经济学家的崛起。新一代农业经济学家的崛起有两层意思：一是一些中老年农业经济学家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搞出一些充满探索和创新精神的研究成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二是一些年轻科研人员以一种生气勃勃的姿态迈入农业经济领域。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组成了自己的研究会或专门小组，对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作极为广泛的研究和讨论。1985年6月，由青年学者倡议，召开了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讨论会，选出论文六十多篇，编成《农村发展新阶段——问题与探索》等等。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年轻学者最突出、最可贵的特点是他们的

大胆探索精神，并且正确提出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建议。现在，我国农业经济学界真正形成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格局。这使人想起两句格言：“后生可畏”，“后来居上”。

（五）走向新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与整个经济社会中的理论突破是密切相关的。中外实践表明，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必须选择适于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这一突破活化了我国的经济理论界，这方面的进展是可观的。

——突破了以不断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带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批判了唯意志论导致的人为地拔高所有制形式、搞穷过渡的错误，明确了社会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突破了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有一元化单一的公有制所有制结构的理论，把集体所有制看成低级的公有制经济的观点，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建立多元化多层次所有制结构的理论，肯定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突破了一种公有制只能有一种经营方式的理论，全民所有制必须由国家直接经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可以适当分开，一种所有制可以有多种经营方式，全民所有制农牧业也可以包给职工经营。

——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取消商品经济，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正统”观点，提出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逾越的阶段，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突破了市场调节只适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标志的狭义观念，提出了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和计划经济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进行宏观控制的有效手段。

——突破了农产品购销只能由国家垄断的单一的流通体制，提出了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理论以及形成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和重大比例关系宏观协调的观点。

——突破了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分配方式，批判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错误，进一步明确了按劳分配原则，在某些合作经济和股份经济中可以保留股份分红，提出了差别富裕与共同富裕统一的观点。

经济改革实践中产生的这些理论突破，反过来又指导经济改革的实践，意义重大而深远。

三

总的来说，与日渐繁荣、极其复杂的农村现实相比，农业经济研究本身还不能说是繁荣的，与人们对经济理论研究的期望相比，我国农业经济研究也不是令人满意的。这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目前，农业经济学界都在为下述难以解决的问题所困扰。

（一）农村商品生产的宏观调节、满足需求与产品出路问题。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兴起，真正的市场机制在农村体现得日益清晰，但是如何利用、引导市场机制，如何把国家的指导性计划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又怎样发挥价格对产业结构调整、资源合理有效利用和促进科技进步的向导作用，对习惯于行政指令和自然经济状态的农村来说，从上到下都没有实践的体验，不能不说是普遍感到困难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经济机构还不能向农民提供灵、快、真、准的信息服务和有效的价格调节，使农村商品经济存在相当大的盲目性。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如何更有效地与国内的非农产品市场相结合，并有效地参与国际市场，目前不能给

出正确而明晰的答案。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农业宏观经济控制问题，包括宏观管理系统和调节系统以及两者组成因子的相互关系和综合运用，采取定性法与定量法相结合，逐步使其数量化、模型化。同时，要开展农业经济信息研究，使之规范化、现代化和网络化，建立起我国农牧渔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信息监测网络系统。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宏观调节，为发展商品生产服务。

经过前几年全国规模的农业区划研究，根据地区优势安排生产，本来可以发挥更大的总体效益，但是由于交通运输跟不上，对地区交通系统的投资又非常有限，目前还不能按照地区比较利益原则，对农业生产实行合理布局。也是由于交通运输很落后，内陆省份尤其是山区许多产品运不出来，省际间的商品流通和科技交流受到很大限制。这样，很难使农村收入实现合理的地区分布。可见，加强农村流通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和加工设施的建设，早已成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关键。这些都是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解决的难题。

(二) 农业和粮食的基础地位问题。与这几年农业高速发展呈逆向趋势的是，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逐年递减，该项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1978年为10%，1980年为9.8%，1981年为6.6%，1984年下降至5.0%；有组织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明显减少。农用生产资料不断涨价，1984年比1978年增长17.9%，比1983年增长8.9%，名目繁多的各种摊派有增无减，许多地方每亩耕地平均达到20—30元。在农户分散独立经营的情况下，国家怎样进行投资改革，如何有效地扶持、保护农业的健康发展，是一个很值得政府加以重视的问题。

在目前的价格结构下，经营什么都比种植业赚钱多、来得快，粮食生产尤其处于最不利地位。随着农村经济活动的非农化和兼业化，农民对农业的技术、物质投入的集约化已有减弱趋势，不利于农业的稳定增长。近几年比较突出的是非农占地过多，出现土地和水资源的低效荒废现象，一些地区的土地撂荒，东南地区精耕细作传统开始丢失等，都有广延开来的趋势。资源浪费和不能合理利用的问题越来越显得严重。广大农民知识水平的低下和现代科技的缺乏，也已成为农业良性发展的一个障碍因素。这些不利因素汇集在一起，加以农村非农化倾向的冲击，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受到威胁，不能不令人担心。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为十亿人民提供食物来源的基本部门，因而是全社会都应关注的物质生产领域。从全民族的长远利益计，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农业科学研究和农村教育投资均应占适当比例，予以保证。看到农业一好起来，对农业的支持就撒劲儿，还打农业的主意，这不是有远见的决策。虽然农业本身必须努力挖掘内部潜力，主要靠内涵扩大再生产，进一步实行有效的集约经营，充分合理地综合循环利用各种资源，注重提高资源和资金的利用效益，逐步增强农业自立发展的能力，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国家对农业可以放松，可以减少对农业的支持。我国农业仍然是一个薄弱产业，对它的自力发展能力千万不能高估。

(三)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产业结构问题。近年开始广泛讨论的农村产业结构被认为有三个层次，即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的比例，种植业与饲养业的比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比例，但每个层次到底怎样配置、农户经营规模到底多大才算合理，却是长期争论的问题。十分明显的是，1978—1984年间，总播种面积减少3.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6.4%，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33.6%；同期，粮食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由80.3%下降到78.3%，经济作物由占9.6%增加到占13.4%。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变化趋势将持续

下去，即畜牧业将有较大增长（见表），原来“粮食—经济作物”的种植模式将变成“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的种植模式，饲料作物的比重将逐步上升，经济作物的面积将适当控制，农村的工业化和兼业化趋向亦将日趋明显和增强。

我国农业总产值结构的变化趋势

（不含村办工业，%）

年 份	种 植 业	林 业	牧 业	副 业	渔 业
1952年	83.1	0.7	11.5	4.4	0.3
1978年	76.8	3.4	14.9	3.3	1.6
1984年	70.1	4.9	17.1	5.8	2.1
2000年（预测）	53.5	8.1	27.7	7.4	2.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0页；预测数据摘自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的报告。

（四）如何充分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近六年来农业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却愈来愈少，表示以前农村早就存在劳动力剩余，我国最大的就业问题显然在农村。但是，要判断农工商之间要保持什么样的劳动力分配比例才是合理的，为时尚早。现在知道，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可以转向农外产业，而且转移的内在动力已经具备，只是外部环境还远不充分。由于国民经济建设投资的部门分布不够合理，城乡的基础设施比较差，城市和非农部门吸收农村多余劳动力的能力还有限。这几年相继有人提出了“离土不离乡”、“小城镇发展道路”、“市辖县”、“离土亦离乡”等转移方式。但由于政策一直处于游离状态，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人们。从战略角度看，单靠“离土不离乡”、“小城镇发展道路”是很难全面解决问题的，需要的是使乡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形成纵横相通的经济网络，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五）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全国农民共同富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全国农业生产分布的纬度差异很大，东西部经济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同一地域内极少数农村个体企业家和农户与广大一般农户富裕程度的差异日益拉大。实践表明，少数雇工的较大企业和农户，生产效率高、规模效率大，受雇的农民和职工认为比自己种地或在别处务工还强。到底应当怎样对待这类企业和农户？它们的发展前途如何？对雇工经营到底应当采取什么对策？谁都看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细小分散的农田结构不利于发挥规模效益，不便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已经显出对发展生产力有一定的限度。当今，把生产集中过程同科技进步结合起来，是世界上农业变革的主导思想和趋势。那么，到底怎样引导土地集中，扩大经营规模？已经出现的各种专业户与农业生产布局的区域化和地区分工是什么关系？农村职工和农民办起乡镇企业，从而闯出了一条实现农村工业化和走向富裕的道路，但它们的原料、能源、信贷、市场又不纳入国家计划，在竞争上比国营工商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到底怎样协调乡镇企业和国营工商业的关系，使这两类企业都能在相同的竞争条件下得到适当的发展，很值得研究。总之，在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多种成分、多层次经营竞相发展和地区经济水平相差悬殊的条件下，怎样调节差别富裕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如何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公平有效地推进农村繁荣，特别是落后地区经济怎样开发，如何使农村收入实现合理的区域分布和合理的社会分布，防止不同地区、不同农户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所造

成的不良社会问题？对这样一大堆令人难解的课题，光有笼统的原则是不行的，必须有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恰当的具体对策，而目前这样可行的宏观决策还提不出来。

对科学研究者来说，正确地提出问题本身可能比解决问题还要重要。困难在于中国太大，具有强烈的历史传统和沉重的社会遗产（人口众多、思维方式、社区结构和家庭模式），东西部发展阶段相差百年，各地自然条件也是千差万别。对于这样一个研究对象，更多的是感到困难重重。然而我们相信，难题多会激发人们去思考，去探索，去研究，从而可能成为农业经济科学走向繁荣和新一代农业经济学家迅速成长的最好机遇。

四

与其他农业大国很不相同的一个特点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全国的农业生产分布纬度差异很大，再加上中国农村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时期，要想对中国农业的未来给予清晰的描述，确实很不容易。象任何国家一样，预测前景是很难的，但预测中国农业发展的前景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农业今后十几年的前景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前几年农业的高速度发展主要源于政策，而今天政策投入效应已开始递减，若无新的重大政策投入，农业前景则不容乐观，要走下坡路；第二种看法则较为乐观，以为中国农民的积极性 and 主人翁感刚刚开始激发，农村外部环境虽不尽人如意，但农民经过商品经济的锻炼，必然能够创造新的增长，尤其是农村自身非农产业的增长必将保持好的势头。第三种看法比较中庸，认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可能呈马鞍形曲线，即前六年的高速增长带有恢复和潜能释放的性质，从1985年开始深入进行的结构调整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必然会降低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总产量，例如1985年农产品的增长速度肯定会低于1984年，而只有经过若干年艰难的结构调整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才能使农业重新上升增长。

不管各方面的说法如何，有些方面倒是明确的，即中国农业正在进入一个比较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到本世纪末，全国城乡人民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东西部经济发展和收入仍将有一定的差别，农业经营和非农业经营的收入仍将保持一定的差距。这里，我们仅根据近年来个人的研究，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今后若干年内中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要低于前几年，但只要政策对头，投入有保证，科技有进步，仍将能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根据中国农科院农经所一个小组采用定性分析与多种计量分析（例如线性规划法、回归分析法、平滑预测法和趋势外推法）相结合的方法所作的研究，从1980年到2000年，不包括乡镇工业的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2%，将达到5400亿元。同期，粮食总产量年均将增长2.5%以上，超过5亿吨，其中饲料用粮将占到三分之一左右，粮食基本实现自给。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增长将是以品种更新、品质优化和单产提高为前提的。中国粮食单产的增长率八十年代为3.3%，九十年代为1.7%，是可以实现的。

另一方面，畜牧业、渔业、林业等将以比种植业更快的速度增长，从八十年代后几年到九十年代，林业和畜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将超过8%，渔业将超过7%。农村工业、商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年增长率将超过10%。到本世纪末，农村非农产业可能安排劳动力1.8—2亿人，产值可达5000亿元，很接近农业总产值的数额。

实现了预测目标，到2000年，中国人均主要农产品占有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人民

食物构成将有所改善。据分析,中国若使居民食物中动物性蛋白每增加1%,就需增加饲料粮500万吨,到本世纪末,动物性蛋白只能从现在的10%左右增加到20%左右;每天人均摄取热量由1982年的2251千卡增加到2400—2600千卡。按照2000年人均粮食425公斤,植物油和食糖各6公斤,肉类23—24公斤,蛋10—10.5公斤,奶25—26公斤,水产9公斤的预测水平,每增加1千万人,粮食需求量即增加450万吨。因此,控制人口仍是艰巨任务,务必不要超过12.5亿。

(二)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有相应的保证。一方面,要设法维持当前的耕地面积,保证农业投资、农用能源、化肥和灌溉。据测算,化肥需要1.2—1.5亿吨,氮磷钾比例为1:0.6:0.2;农药需增加到28万吨,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比例为6:2:2;灌溉面积扩大到8.0亿亩;农机总动力达到2.5—2.7亿马力;农村用电达到460亿度;农用塑料薄膜达到70万吨。另一方面,要有稳定的政策保证,政策多变会给农民心里留下了阴影。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国家的富民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当代中国的大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农村以合作经济为主体,多种成分、多种形式的经营并存、竞相发展的势头将持续下去,政府将通过日臻完善的调节系统把它们纳入国家计划和社会需要的轨道,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发挥各自的作用。但是,考虑到目前农村繁纷复杂的现状,为了保证主潮流、总趋势的健康发展,给予法的规定显然是必要的。目前正在引起人们注意的农村法规有:家庭经营法、土地法、继承法、企业法、雇工法、个人纳税法等等。中国缺乏法的传统,法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远远低于传统伦理对社会延续和维系的作用,因而建立法制要比欧美国家艰难一些。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普通农民都感受到,要建设一个现代文明的中国,要发展繁荣的农村经济,法律是一块必须有的基石。

(三)根据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政府将通过恰当的办法,引导土地集中,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各种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自愿互利的联合,特别是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将发展自愿互利的联合与合作。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方面将会更多地听取农业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并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

(四)我国农业发展要走集约经营之路,就必须加速农业科技进步,其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为此,在普遍加强农村教育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加强农民成人的职业教育和科技推广工作。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现在正以越来越大的热情关注着农民的教育,也愿意以越来越多的代价来取得农业的科学技术进步。农村干部、成年农民的职业教育,在校农村青少年的农业教育均将加强。

尽管我们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但是我们相信,上述预测目标将能实现,我国农业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

论农村商品生产逆向开发战略

张沁文

所谓逆向开发战略,就是在农村商品生产过程中,根据市场需求,从流通入手,倾大力组织

好商品的销售和产品的加工，根据销售和加工的需要，发展农业生产。这样做，不仅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而且能正确引导生产，减少梗阻和浪费，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一

在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从产品的生产、加工、经过流通渠道进入消费领域，各环节依次运行，周而复始，形成社会再生产的流水线。如何加速再生产的流程？一般有两种考虑。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从资源条件出发，有什么资源，生产什么产品；除自身消费外，剩余什么产品，出卖什么产品。这是顺向开发，通常把着眼点放在为生产产品创造条件上，如为农业搞好农田建设、水利灌溉、提供良种等。另一种考虑是从再生产的终端出发，搞好农产品的流通，根据市场的需求发展加工业，根据加工能力对农牧产品的需求和一次性农牧产品的市场需求来确定农牧业生产的品种和产量。这样通过搞好流通和加工，为农业生产创造需求，从而刺激农业生产，就是逆向开发战略，是加速农产品转化增值的战略。

在社会再生产中，这两种开发战略决定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都属于历史范畴。在商品经济不发达阶段，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只能是顺向开发。人们只活动于生产领域或主要活动于生产领域，逆向开发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当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逆向开发战略才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商品生产的目的、行为迫使人们把着眼点移向市场，市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围绕市场需求来组织产品的销售和加工，建立产中的服务体系，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我国各地考察，凡是发展商品生产的佼佼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逆向开发战略的开路先锋；凡是商品生产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实施了逆向开发战略。引人注目的温州巨变，主要经验就是从商业入手，带动工业和农业，并使运输、服务、旅游、邮电、信息、金融等行业百业俱兴，农村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我国现阶段发展商品经济，要自觉地实行逆向开发战略，这是顺应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抉择。众所周知，尽管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多年，国家在农业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积累了相当的物质条件。1979年全国农业基建投资62.5亿元，比1952年增加11倍。只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的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导致了一方面客观上对产后环节缺乏服务需求，一方面农业投资形成的积累作为潜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生产领域积累的物质基础所形成的生产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转化为越来越多的农副产品。这样，加工、销售、贮藏等产后条件就显得极不适应，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瓶颈”，给农民带来巨大损失。山西晋东南全区年产干鲜水果1亿多公斤，大部分因加工、运输跟不上去，只能就地处理，有的甚至白白烂掉。仅有8万多人口的山西省吉县，每年20万公斤落果得不到加工利用，任其霉坏变质。还有不少地区出现种种买难卖难。实践证明，只考虑生产过程已远远不够了，过去那种产出粮、猪即止的经济行为也远远不够了，立足于过去产后服务薄弱的情况，不得不承认我们遇到了发展商品生产的严峻困难。所以，从当前看来，在产后这些环节上增加投入，既是对过去的补偿性投资，又是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必要投资。这也就是实施逆向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更是当前发展商品生产必须实施逆向开发战略的有力佐证。

二

1985年，赵紫阳总理提出了在沿海地区农村实行贸工农的方针，要求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发展对外贸易加工制造业，根据加工业所需的原料安排农牧业生产。我们认为，这个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它使沿海地区的农业瞄准了国际市场，按需求发展生产，这是一个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折，是产品经济观念向商品经济观念的真正转折。其实，贸工农的方针不仅仅适应于沿海地区，而且中间地带、落后地区也应走贸工农的路子，但这不一定是外贸，主要是内贸，或者叫商工农。因此，可以这样说，“贸工农”的方针是逆向开发战略的形象化、具体化，而且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具有普遍的新质意义。它决不是不重视农业，决不是把农业由老大推到了老三的位置，而是从市场着眼，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创造需求。

谈到这个问题，过去比较习惯的提法是，一讲“发展”就要讲“投入”、建“基地”。一说投入就是创造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一说建基地，就是种草若干，成为牛、羊基地；修渠若干，成为粮食基地；扶持草籽款若干，成为草籽基地或牧业基地等。目前，强调要保持农业后劲，因而又重申加强基本建设，主要指农田水利建设、水土保持、农业机械、化肥、塑料薄膜生产等。所有这些，都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在最近几年国家投资锐减的情况下，要求增加投资的呼声日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确实是客观需要。但是，产后加工、流通领域的开发投资也是必不可少的。三十年来，有些地方年年种草不见草，年年栽树不见林，年年投资建基地，形不成基地。实践证明，发展商品生产，只知道订计划、下指标、埋头生产，不懂得掌握市场信息、根据消费需求安排生产，是一种源于传统经济的非科学的战略，光有产前、产中投资而没有产后服务，诸如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工业、饲料工业、贮藏、流通等配套建设的投资，是一种不完整的投资设计。我们认为，在产后这些环节上的建设同样是发展农业的基本建设，在这些方面追加投资同样是为农业积累后劲的投入。产前、产中投资可看作为推力，产后投资可看作为拉力，一推一拉形成农业发展的驱动合力。只有产前投资，而没有产后投入，便不能形成合力。不仅产前投资不能获得最佳效益，反而会形成力的摩擦和抵销。据报道，吉林省农安县的养鹅业经历了一个“兴—衰—兴”的曲折过程：1979年，农安县得到“雁鹅在广东畅销”的信息后，全县大力发展养鹅，一下子增到50万只，比往年翻了一番。春去秋来，县里挑选了1万只肥鹅，装上火车发往广东。迢迢数千里，历经半月。到站卸车一看，死的死、病的病，剩下的成了又瘦又脏的癞皮鹅。一算帐，一只鹅赔1.55元。消息传回县里，人心一下子凉了。时值大雪铺地，城乡集市上，顿时挤满了鹅。一时间愁坏了养鹅人。事后，县领导总结了教训，认识到：只抓养鹅，不抓市场不行；抓市场，不抓加工、储藏、运输、销售这一系列环节也不行。于是，他们把原有的兔肉加工厂和冷库改建成宰鹅加工厂，把活鹅加工成白条鹅，解决了活鹅外运难的问题。同时，县里正筹建羽绒加工厂和羽绒制品厂，将对鹅肝、鹅胆、鹅血、鹅肠进行深加工，重振了这个县的养鹅业^①。这里既有只抓产前、不抓产后的教训，又有双管齐下的经验，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倘若起初就循着逆向开发的思路来发展养鹅业，就能避免一度时期的养鹅衰落。过去的三十年，长官命令使农民只知道埋头拉车，责任制后，农民虽然有了自主权，但多数农民的行为极限也

^① 关东镇等：《农安县养鹅业的兴—衰—兴》，原载《人民日报》，1986年4月23日。

不过是自己拼命生产，而把销售的希望寄托于流通部门的服务，但我们各级领导和流通部门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现在急需经济决策观念、行为的根本转变，重视流通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当然，讲拉力，不可忽视推力；讲产后投资，并非说产前投资不重要。抽象的单方面比较，很难决定谁轻谁重，不同情况下，有时“推”重要，有时“拉”重要。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拉力不足，产后服务薄弱，造成卖难，产品低水平过剩，缺乏自调功能，弹性应变力太差。因此，当前发展加工业和搞好流通是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最重要环节，在这方面增加投入比在农业生产条件上增加投入更为重要。当前，不少同志根据“六五”时期农业投资减少的状况，呼吁“七五”期间国家要增加农业投资，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我们认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投资固然必不可少，但是仍然继续忽视增加产后服务体系的投资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应当及早提出来，合理安排农业投资，以免将来顿足惋惜。所以，在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工业、饲料工业、流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诸如公路、仓库等的修建都应当列为“七五”期间的农业投资重点，这是实现“七五”战略目标的物质保证。

这里应当指出，人们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还缺乏正确认识，认为农副产品加工经济效益太低，不如接受城市工业的扩散产品“油水大”。我们觉得，对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不能光算企业的经济效益，还应算产前、产中、产后带来的诸多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加工业既可为农副产品提供市场，又可以减少产品的霉坏变质，还可以安排农村剩余劳力，增加工资、运输、劳务等收入，减少仓贮和运输压力，为国家交纳税收，为集体提供积累。更重要的是还能带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如山西省山阴县1985年奶牛发展到8000头，一头奶牛收入2000元，主要因为这里兴建了两家奶粉厂，消化了当地的鲜奶。再如，晋南、晋东南许多农民靠种山楂致富，原因是那里建成了一批山楂罐头厂。实践证明，只要以加工业为龙头，农副产品的生产就能迅猛发展，农民为此而获益非浅。反之，农副产品的发展将十分缓慢，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趋于萎缩。所以，我们应当坚定地认为，加工企业微利要办，即使微亏也要办，微亏部分应建立一种基金予以补贴，就权当是国家对水利、水保建设、产品基地建设年复一年的维修管理投资。当然，随着企业管理的加强，经营活动的改善，一时的微亏会变微盈，微盈会渐滚为大利，成为国家的一大财源。我们应当在加工、流通等农业产后服务环节的补偿、配套上大量增加投资。这样，既可以填补我们二十多年来农业再生产过程中产后服务环节的严重不足，改变目前加工、流通落后的现状，又可以求得再生产诸环节的相适平衡。

当然，根据事物的运动规律，这种平衡也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由于市场需求在不断变化，不断扩大，所以，各环节求得初级平衡之后，还会出现新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由市场打破，还需靠国家的宏观控制与市场调节实现新的平衡，使社会再生产在动态平衡中健康运行，并不断扩大规模。温州大地就是循着这一“轨迹”发生巨变的，表面看来，温州生产似乎是盲目的，其实他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行产销挂钩，以销定产，其发展速度、生产规模、经济效益都是过去“包揽一切”的计划所无可比拟的。

应该看到，这种逆向动态平衡也是逆向开发战略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不同于传统的顺向动态平衡。前者是以尽可能地为满足市场为准绳，从市场出发，没有资源可以找资源，没有人才可以引进人才，是一种跳起来摘桃子的积极的发展战略。这几年一些工业品的逆向发展也证明了这个道理。我国的收录机生产就是从最终制成品开始，逐次向上回溯直至自制原材

料。1981年我国生产的收录机有46%是由进口元件组装的,1984年只有7%是用进口元件组装了,短短三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原北京汽车制造厂近年来同国外合营,生产具有八十年代水平的四轮驱动吉普车,走的也是这条路子。从广义上讲,这是逆向开发战略在更宽广的生产领域中的运用。我国“七五”计划中贯穿了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布局,即:从消费结构起,然后研究产业结构怎样调整,使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实质上这也体现了逆向开发的战略思想。不过,这已超出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战略的特殊意义。相反,顺向动态平衡则从资源出发,以生产能力为限度,恐怕只有一个产品越多越好的模糊概念。至于能卖多少,那是前途未卜、不置可否了。充其量是一种资源经济,是一切从自我做起的封闭型经济。

所以,两相比较,逆向开发战略有利于促进人们为满足市场需求积极思考,增强应变能力,培养创新意识,生产力要素投入少而组织合理,见效大而逼近市场。顺向开发却带有一定程度的惰性,有一种因循守旧的劣根性,在商品生产中如坠雾海,不辨东西,特别是往往伴随着巨大浪费,往往以浪费为代价刺激了解决下一个环节问题的需求。并且这种滞后性的需求要转化为现实,困难很大。仅就我国现状而言,农民刚开始学习商品生产,还不习惯于瞄准市场,还不习惯于筛选、利用信息。但是,在我国现有农产品加工能力的情况下,要使农民具有适应这个加工能力的应变能力,很难办到,农民几乎养什么就卖什么难;少养一些什么,市场上又出现了买难。总是接受了买难的信息,得到了卖难的结果,陷入由买难到卖难的恶性循环,农民似有一种无所适从的市场恐惧感。如果我们不在产后环节上做文章,不在流通、加工条件上花大力,市场上买难一出现就提价,农民卖难就降价,这实在是一种消极的做法。原则上讲,生产随着市场的扩大、缩小而扩减,但自然再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并非需求增长马上就能产出产品。这就需要有相应的加工能力,加工、贮藏要有一定的弹性,这个弹性是与市场的需求弹性相适应的。所以,我们只有从市场需求着眼,从农副产品的加工、流通入手,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卖难的问题,才能建立起合理的具有弹性的农村产业结构。才能使农村经济成为具有自调功能的经济机体。要实现这一战略转变,我们将有许多工作要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已经拉下了步子。不少国家农业产值同食品工业产值的比重大都在1:2左右,日本为1:2.4,英国为1:3.6,我国为1:0.3,杭州市为1:1,山西仅为1:0.17,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既说明了山西农副产品加工业基础薄弱,同时也说明,山西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如果山西达到杭州市的水平,则以现在的农业产值计算,食品工业产值可增加40亿元。

三

逆向开发战略中蕴含着一种新的经济思想,与传统的顺向开发在思维上有质的区别:

(一)立足点不同。传统的顺向思维立足于自然经济;新的战略思维立足于商品经济,它追求的目标不是产品使用价值的获取,而是产品向商品的转化、产品价值的实现。它们各自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形态下的思维方式。

(二)对再生产过程中要素组合的方式理解不同。传统的顺向思维只注重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物质要素的组合,对生产要素的理解只限于劳动力、工具、土地和其它劳动对象;新的战略思维不仅注重再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组合,而且注重流通、消费等环节的配套,对再生

产过程中要素的理解除了物质要素之外，还包括非物质因素的经济行为，由这两种复合而成的能力所创造的不仅是物质产品，更重要的是对产品的需求。

（三）对生产的过程理解不同。传统的顺向思维把生产过程看作一种孤立的单向直线过程，从投入物质资料到产出产品即止。新的战略思维把生产与分配、流通、消费看作一种循环往复的再现过程，也就是商品经济活动过程。把消费看作为刺激再生产的动因，所以把经济开发的着重点放在流通环节。

（四）对产业发展递进方式理解不同。传统的顺向思维认为只有一次产业熟化，才具备向二次、三次产业依次递进发展的条件，仅有一种推进的概念。新的战略思维认为，发展二次、三次产业，不仅能直接吸引大批劳动力进入先进产业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能拉动一次产业的延伸发展，具有牵引力的作用。

可见，传统的顺向思维，是限于考察有限系统内部因素组合的封闭型思维方式；而逆向开发战略思维是考察社会经济大系统的广泛联接关系的开放型思维方式。假如离开经济发展的实际，从纯粹思维形态来考察，逆向思维与顺向思维是互为补充的思维方式。在处理任何事物中，都可以采取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两种思维方式，把问题发掘的更深刻、更合乎逻辑。

四

在我国农村正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模式转换中，逆向开发战略是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选择。地方经济部门要把逆向开发作为加速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一种指导思想和指导方法，为了加速逆向开发战略对顺向开发的扬弃过程，必须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一）每个地区每个企业，都应重视商品的流通，以销售带动生产的发展。要调查研究市场需求，派出销售人员，大力推销商品。在推销服务中及时反馈信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改进产品，推陈出新。

（二）疏理流通渠道，改革流通体制。赵紫阳总理在考察川鄂边贫困山区时指出，山区脱贫致富的根本问题是要发展流通、交通，搞活经济，开发资源。这一指示不仅适用于贫困山区，而且对全国农村都有普遍意义。目前，一些地方出现的卖难并不全是农产品过剩，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流通渠道不畅，致使同一产品此地卖难，彼地买难，流通渠道少，流转环节多，致使同一产品在流转中费用层层迭加，严重挫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所以，解决农村商品生产遇到的问题必须从改革流通体制入手，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开展跨地区流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商业企业的积极性，热情扶植广大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同国营、集体商业部门展开竞争，促使其形成新的商业行为，形成日益活跃、健全完善的流通服务网络。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之具备一定的“蓄水”能力。首先是搞好交通建设，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这是疏理流通渠道的最基本条件。其次是兴建仓储冷冻设施，建设适量的“蓄水池”。因为：一方面农村商品流通是农产品购、销、调、存依次运行的有机过程，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流通都会发生梗阻；另一方面，从生产和消费的不同特征来看，由于农产品生产有一定的周期性和较强的季节性，还可能遇到一定程度的自然风险，而且地区之间生产不平衡，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股“洪水”。相比之下，消费却象一股四季不断的“常流水”。如果没有必备的仓储设施，就象洪水暴发而没有蓄水库一样，人们只能在忍受涝灾的